

第二章

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期： 一个概念性框架和新的实证证据

Ross Garnaut

1978 年，中国作为一个劳动力富余的经济体开始了市场改革和持续强劲增长的时代。在一个相对稳定不变的实际工资水平上，这个现代的工业经济体的快速经济增长获得了它所需要的充足的非熟练劳动力。这个特点也造就了中国在改革后期的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现象：相对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储蓄和投资在 GDP 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贸易与经常账户盈余出现增长的趋势，以及收入分配方面日益严重的不公平。

现在，极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证明，劳动力过剩和合理的、稳定不变的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以往的实际工资较少变化是以人口不断大规模地由农业转移到工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来支撑的。这种改变对于中国发展的各个方面来说都影响深远。本章将探索这些实际影响，并重新考虑这种结构性转变的紧迫性。

四年前，本系列丛书是以《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Garnaut 和 Song, 2006）为题目。那本书开启了一个热烈的讨论，即中国正处于或接近一个由劳动力过剩经济体向劳动力短缺经济体转变的过渡点（Garnaut, 2006；Garnaut 和 Huang, 2006；Cai 和 Wang, 2006；Garnaut 和 Song, 2006：第 1, 2, 9 章）。对于这个讨论有重要贡献的学者们于 2010 年 4 月参加了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北京举办的一个研讨会。这次研讨会上的一些论文经过遴选和编辑之后作为一个专题发表在了 2010 年的《经济学季刊》（*China Economic Journal*）上。蔡昉等人在那次研讨会上建议将一

个精确的时间点——2004 年——作为这个转折点。

2006 年的那本书的第二章是 Garnaut 和黄益平的研究成果，他们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宏观分析，总结了不断出现的证明在中国部分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的证据，同时证明中国的工资增长率存在加速的趋势。这都符合阿瑟·刘易斯的有关劳动力过剩的理论，正是他的理论首先提出了与劳动力有关的经济发展中的转折点理论。Garnaut 的那篇文章通过展示一些人口统计学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图表，证明中国经济到 2020 年将会产生结构转变，而原因就是快速增长的对于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和不断减少的劳动力供应的矛盾。

蔡昉和王德文在 2006 年那本书的第九章指出，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了世贸组织（WTO），那时候还远没有像一些人害怕的那样出现失业问题，相反，入世使得中国以国际为导向的经济增长加速。不断增加的对于城市劳动力的需求以及中国新兴的人口转变都导致了农民工短缺，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农村劳动力供给正在从无限过剩向有限过剩转变（Cai 和 Wang，2006：143）。

而当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萧条影响到中国的时候，早先认为劳动力短缺和实际工资上升会很快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的观点被淹没在相反的现实大背景中。在 2008 年末和 2009 年初，对中国出口品的需求出现了大幅度、急剧的下滑，相伴出现的还有中国沿海城市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Garnaut 和 Llewellyn-Smith，2009，尤其是第九章）。

尽管劳动力市场的衰退非常严重，但这种衰退也是很短暂的。非熟练工人的短缺和实际工资的增长很快又成为现实，这部分是由于 2008 年末中国开始实施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复苏。

所以，现在是时间来再次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问题了。

本章将会提供一个概念性的框架来研究中国的转折点的影响，并检验目前的实证证据和未来可能的趋势。这方面的一些概念性的材料将另外构成一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并即将发表于《经济学季刊》上。本章的实证方面的内容则是通过吸收和列举《经济学季刊》上相关专题中的其他文章的观点来对 Garnaut 和黄益平（2006）以及蔡昉和王德文（2006）的观点进行更新、升级。

劳动力过剩的经济

“转折点”这一概念来自于一个很流行的关于某个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

的经济发展的模型，该模型首先由威廉·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 1954）提出。这个模型后来被不断完善，并被 Fei 和 Ranis（1964a, 1964b, 1966；Ranis 和 Fei, 1961, 1963）用来研究东亚的情况。同时该模型还被 Minami（1973, 1986）使用在他关于日本经济发展的著名著作中。

这个模型中的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是二元的，包含一个具有高度生产力和活力的“现代的”、“城市的”、“工业化的”、“资本化的”部分和一个相对来说非生产性和停滞未发展的“传统的”、“乡村的”部分。在典型的劳动力过剩经济模型中，农村地区的劳动力的边际产出远远低于农村地区的贫穷居民所享受的生活标准（在这个模型的某些版本中，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农村地区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零甚至是负数。）

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仍然在这些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之上，这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制度的扶助，这类制度包含一些收入和劳动雇佣的共享因素。对于这些人来说，从农村移居去城市是存在风险和成本的。除了农村典型的生活标准之外，通过评估这些风险和成本，就可以确定劳动力的“保留价格”，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农民决定向城市迁移的城市工资水平。而城市中的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是绝对的正数。

当一个工人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整个经济的产出就提高了：城市的产出提高较多，而农村产出几乎没有减少或减少得较少。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是平均生产力和总产出增长的主要来源。从数学方面来看，农村地区的平均产出增长也是由人口迁移造成的（因为产出不变而人口减少）。但是在现代经济扩张的早期阶段，农村地区仍然存在过剩的劳动力，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仍会很低甚至为零，而且这个阶段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农村劳动力的保留价格也会依然很低，而且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因为城市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而有所提高。

来自农村的具有“无限弹性”的劳动力的供给的存在对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城市经济的快速扩张和增长可以不引起实际工资的增长。随着时间推移，基础设施的完善、劳动力素质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从投资回报率提高、现代产业收入利润率增长中就可以反映出来。经济中现代产业份额的增长也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利润率的提高。

相比于工资来说，储蓄是利润中占比例更大的一个部分，因此收入利润率的提高常常伴随着整个经济中储蓄率的提高。而更多的储蓄反过来又会支撑更多的投资，因为一般情况下各国都偏爱投资。接下来，高投资回报率又

可以进一步促进和鼓舞本国投资的发展。

消费占比的下降则是储蓄占比增加的另一个后果。同样从数学角度来看，如果储蓄的增长远远超出了投资方面的需要，那么产出的增长率就会降到较低的水平，而这也与近些年中国的现实情况高度相关。在一个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中，这并不会导致国内资源日益利用不足，但是它会导致经济增长率的无谓降低，而这又会进一步导致农村经济中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现代部门的进程有所延缓。

另外，如果现代部门的投资回报率较高而且不断增长的话，投资在经济中的比例将会比储蓄所占的比例增长得更快，这就会使对外贸易和经常账户有出现赤字的趋势。而如果公共部门所占用的资源增加得很快，甚至比吸收多余的私人部门储蓄所必需的资源增长速度还要快的话，那么同样的结果也会出现。只有在该国允许资本自由进入国际市场的前提下，这样的对外经常账户赤字才是可持续的。如果赤字是可持续的，那么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率也会提高，而这一增长率正是农村的剩余非充分就业劳动力被现代的、更具效率的产业吸收的增长率。

随着投资回报和利润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储蓄在收入中占比的增长，我们可以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在经济中的比率也会增长。而投资的增长和不断扩张的现代部门在总体经济中的比例很可能会导致产出增长率随着时间不断加速上升。

在农村地区，劳动的边际产出仍然远远低于通常的最低收入水平。现代行业的扩张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使得人们没有压力去提高劳动生产率。农村地区的平均生活标准提高了，却没有对转移到城市现代部门中的低收入工人的典型的收入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在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中，当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产业出现之前，比较优势起初在商品出口中并不重要。而现代化的经济增长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得国际贸易在比较优势的指导下转向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为主，随着现代部门的扩张和这些现代化产业所占据的出口份额的增长，出口的增长越来越有赖于比较优势了。随着资本在现代部门中快速积聚，以及劳动力快速学习行业纪律和技术，在现代产业中生产多种可贸易品和服务就变得利润丰厚了。一些更为复杂的产品的生产中出现了新的比较优势，同时却没有减弱劳动密集型可贸易产品生产方面所具有的竞争力。在这个阶段，在可贸易品部门中也没有要求缩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压力。

在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中，随着工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与之

相伴随的是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公平日益严重。投资和产出增长得越快，收入分配不公恶化的速度也就越快。但是经济增长得越快，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速度也就越快，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被更具有生产力的现代化部门吸收的速度也越快，这个经济也就能越早达到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稀缺转变的那个转折点。

转 折 点

如果现代化部门经济增长的速度比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速度快得多，甚至快于农村中就业年龄人口自然增长速度的话，那么农村地区迟早将不再会有剩余劳动力。当达到这一点的时候，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任何迁移都会使得农村地区的劳动边际生产力高于该地区的工资，从而使得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实际工资增长。这一点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

从这个转折点开始，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开始上升，而利润的比例开始下降。而消费所占的比例应该会随着工资的增长而上升。消费在整个经济中的比例上升，而储蓄所占的比例则会下降。

城市中工资水平的上涨很可能会导致现代化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的回报率下降。投资利润率下降，而一般家庭开始偏向于投资使得储蓄减少，都可能使总投资减少。

如果所有条件保持不变，一般认为随着投资的减少，经济增长率也会下降。但是，这并不是经济发展到达转折点时所必然发生的现象。在两种情形下，经济增长率不会出现下滑。第一种情况是，在转折点之前，储蓄就达不到投资的需要，致使对外贸易和经常账户出现盈余。这样，转折点之前的经济增长率是比较低的，因此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就会不必要地被延后。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消耗的再平衡由投资需求向消费转变，收入中工资所占的份额也上升，但不会引起资本存量增长率的降低。

第二种在经济发展到转折点之后可以不引起经济增长率降低的情况，则是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率的增加可以平衡降低的投资率和资本存量增长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转折点之后生产力增长率会有所增加。工资的增长会促使人们节约劳动力使用量，并且会提高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生产力增长率。

结果就是，经济增长率会更高，在转折点之后的增长率则会与劳动力过剩时期的增长率相似或稍低。

无论转折点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如何，储蓄率下降的趋势都可能远远

强于投资率下降的趋势，导致对外贸易盈余减少或赤字增加。

转折点之后，经济增长会有逆转的趋势，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况会恶化。但最终，农村地区和城市中的低技能工人也可以分享现代经济增长的果实。转折点之后，投资、生产力和产出的增长率越高，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就越快，农村和城市中的工人的收入水平增长得也就越快。转折点之后的增长率越高，收入差距过大也就能越快得到遏制。

转折点之前的经济快速发展对于缓解收入分配不公所起的最主要的作用，在于它可以及时显示出劳动力何时变得稀缺以及劳动收入从何时开始增长。而在转折点之后，经济快速增长在缓解收入分配不公方面所起的最主要的作用，则在于它加速了实际工资的增长，也加速了农村地区生活水平改善的速度。

在转折点前后，劳动收入在收入比例中的份额变化是解释“库兹涅茨曲线”的一种方式。“库兹涅茨曲线”是描述这样一种趋势的曲线：现代的经济增长一开始总是会加剧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而后来又减轻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至少在经济发展的转折点之后的一段时间可以缓解这种现象。

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并不必然会达到转折点。只有当现代部门的增长率足够快，而且劳动密集型产业吸收农村劳动力的速度远远快于农村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的时候，转折点才会出现。如果劳动力过剩经济中的现代化部门相对于人口增长率来说增长得太慢，或者政策的扭曲导致增长与对劳动力的低需求相伴的话，那么现代经济增长就可能伴随着实际工资的持续稳定和收入分配不公的持续恶化。

实际工资在经济发展的转折点之后随着持续的经济增长而快速增长。而这是不是通货膨胀则主要取决于货币政策。只要经济增长适度地、强劲地持续下去，那么相对于国际可贸易产品的价格来说，实际工资的增长会提高国内成本。也就是说，实际汇率会上升。而且无论名义汇率管理机制是怎样的，实际汇率都会上升。实施使国内货币的国际交换价格上升——也就是名义汇率升值——的货币政策可以在实际汇率上升的同时更有效地将通货膨胀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转折点之后的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避免通货膨胀的出现，需要在名义汇率升值的时候执行坚挺的货币政策。

当然也会有经济政策错误的风险，如果这种风险成为现实，那就会不必要地降低经济增长率，并降低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实际工资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如果政府在试图避免名义汇率升值（或许是出于保护竞争力下

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考虑)的同时担心出现通货膨胀,就可能寻求紧缩政府购买来力图使通胀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这又会使得对外贸易和国际账户出现盈余。短期内,经济增长率会被拉低到可持续增长的水平之下。贸易账户的盈余也会产生货币政策扩张的趋势,同时也会使通胀压力再次出现。最后,经济增长率很可能会向着可持续的水平发展,实际汇率也会在通货膨胀之后升值。

任何试图保护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最终希望阻止本国货币升值的行动,最终都被证明只会有暂时的作用。而这种暂时的行为可能会潜在地产生更大的成本:整个经济会经历不必要的通货膨胀,而且会无谓地损失一部分经济产出、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的增长机会。在比较糟糕的情况下,通货膨胀会破坏政治和经济生活的稳定,并对经济增长和潜在的生活水平改善方面造成更大的损失。

转折点之后,国际贸易方面的比较优势会由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更为资本密集型或更具有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上去。这些技术上更为复杂的产品需要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教育和培训)投入,还需要通信设施以及金融和管理上的安排。这些需求都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经济发展的转折点之前相比,这些领域更可能在转折点之后成为阻碍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瓶颈。

典型的劳动力过剩模型在现实世界中的变动

像其他任何模型一样,刘易斯(Lewis)的劳动力过剩经济体模型也具有现实意义。这其中有一些对于分析当今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很大意义。本部分将揭示当把这个模型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时候,中国的现实与模型中的典型经济可能存在差异的几个地方。

中国的现实与该模型存在的最重要的一个不同就在于,在广阔的经济背景下,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地理上的自然分化。在中国,劳动力在各省和各地区之间的流动是不完全的,因为在各个农村地区和城市间存在着不同的壁垒。劳动力的不完全流动性和各种各样的壁垒可以由中国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工资水平和不同的物质生活标准体现出来。这一特点的结果就是,当城市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增加的时候,某个地区提供的劳动力数量与其他地区所提供的劳动力数量相比可能会不成比例地多或少。农村的某个地区可能会发现当地的富余劳动力已经完全被现代经济部门所吸收,由该地区迁移的

工人所要求的实际工资开始大幅增长，但是在其他地区却又可能还存在着过剩的劳动力和“传统”的低工资现象。在某些城市，相对低技能的劳动力可能会变得相对稀缺，而且实际工资会增长，但是在其他一些城市又可能以低成本找到足够的劳动力。

中国广阔的地域和各地区间差异巨大的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一个最主要的结果就是随着实际工资大幅增长，中国经济会出现一个“转折期”而非“转折点”。某些城市的实际工资大幅上涨，迫使收入利润率开始下降，消费开始增加，简单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和技术开始出现结构性变革，但同时，在某些其他地区的城市中低工资依然存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可以继续繁荣和扩张。农村地区也与此类似，某些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开始变得相对稀缺，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生产逐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但与此同时，某些地区的农村仍然存在富余劳动力。

劳动力过剩模型与中国现实的第二个差异在于，对于那些潜在的农村移民来说，模型假定生活标准是稳定不变的，一直到有足够的移民可以将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提高到这个标准之上为止。而事实上，在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的早期，更高的平均的物质生活标准和消费水平都可能通过农村这些潜在移民的生活状况的改善反映出来。结果，在现代经济发展的早期，农村劳动力的保留成本在某种程度上就会上升，也就是说城市工人的工资水平会上升。经济进入转折期的标志是工资增长加速，而非实际工资从基本稳定变为大幅增长。

劳动力过剩模型与现实的第三个背离在于，在现实中，由于教育、培训和在现代经济中经历的不同，劳动力在技能方面会存在着高度的差异。模型强调的是相对低技能的劳动力，但是这类劳动力随着教育、培训和各种经历的增加会不断减少。这个因素的变化会影响转折期的到达时间和持续时间，因为正是在转折期内，这类非熟练劳动力变得稀缺而他们的工资也开始上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均教育水平上的投资不断增加，现代经济中的人们在实际中的技能累积也在增长，这些都在减少低技能劳动力的储备。这也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期提前到来。再加上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以来的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所带来的人口逐步减少，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中国与其他正走向和已经走出转折点的劳动力过剩经济体相比，会在转折期内和转折期后经历一个更为急剧的实际工资增长的过程。

劳动力过剩模型与现实的第四个背离在于实际经济中不仅仅只存在

“传统的”和“现代的”两个部门。因为还存在政府部门，政府部门为经济提供服务并修正各类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同时也会影响农村和城市地区的生活标准和水平。政府部门提供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关键要素。在一个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发展的早期，政府部门对于资源的掌控管理和其提供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的作用相对来说可能较小。随着现代部门的发展，政府对于资源的潜在掌控不断扩大，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政府的作用也会在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变得更为重要。

模型与现实的前两个差异所产生的最主要的影响在于，其会把转折点变为转折期。

而模型和现实的第三个差异的主要影响在于，它可能使经济及时到达这个转折期并缩短转折期的长度。

至于第四个差异，它的影响则是多方面的。农村地区政府的改进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保留价格，因此也就提高了城市中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而政府提供教育服务可以缩小过剩劳动力的来源池，从而使经济加速到达转折点。公共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扩大经济对现代工业部门的各项需求，同样可以使经济加速到达转折点。

政府的政策可能影响人口增长率，随着时间流逝，也会影响农村地区的非熟练劳动力的数量，从而也可能影响现代部门经济增长的劳动密集度。在转折点之前，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否有效地提供各种要素也会影响经济增长率。但是，在转折期和转折期之后，这种影响会变得更大，因为这时候的经济增长会对基础设施、教育、技能、财政服务以及政府对私人经济活动的合理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

2006 年中国进入转折期的证据

Garnaut 和黄益平（2006）分析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的一系列因素，最终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将在不久之后达到这个转折期。最近各个地区关于劳动力短缺的证据和实际工资的大幅增长已经开始证明这一点。大约一代人之前的出生率开始突然大幅下降导致的人口结构转变、现代部门经济强劲增长、农村教育特别是女童教育状况改善，再加上一些农村和城市地区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这些都无一例外地说明转折点即将到来。

我们观察到，在 1978 年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之后的最初几年，农村地区存在的严重的非充分就业和由农村进入城市的工人所释放出的潜在生产

力都为这个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条件。在经济改革开始后的 20 年里，大量的农村居民进入工业部门，而这些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基本上一直保持稳定。我们也注意到，那些说农民工短缺的报道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权威数据显示中国还有 3 亿农业工人，这个数字大大高于目前的农业技术水平下的农业生产所需要的人数。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当前的短缺只是反映了暂时性的影响，而不是中国已经渡过了经济发展的转折点的结构性因素。不断增长的食物价格和政府各项改善农村人口生活状况的措施都提高了农村工人的供给价格。而缺乏一个高效的、可以反映真实情况的劳动力市场也使得中国出现了地区性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即便中国并没有出现全国性的劳动力短缺。城市中的雇主们需要提高生产效率并渴望找到具有两三年工作经验的工人，因此某些关于劳动力出现短缺的报告可能与直接来自于农村的非熟练劳动力无关。实际上，并不是所有来自于农村的工人都是城市所迫切需要的，18 ~ 25 岁的女性是最抢手的，但在总共 7000 万工人中，这类人已经基本被发掘殆尽了。

尽管如此，有许多人都声称劳动力已经短缺而且还有一些统计数据支撑。农民工的货币工资在 2004 年上涨了 20% ~ 40%。劳动者的附加福利在范围上和数额上也都经历了快速的扩大和增长，因为雇主们都试图使自己提供的合同更具有吸引力。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劳动力成本上涨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经济体在成功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正常现象。以美元价格计算，中国 2006 年的实际制造业工资是当年美国水平的 5.6%。韩国的这项数据在 1975 年时是当年美国数据的 5.2%，直到 29 年之后达到了美国工资水平的 49.7%。我们不禁要问：要使中国的制造业工资水平超过美国水平的一半，我们需要的时间将长于还是短于韩国所耗费的时间？

在过去 20 多年的改革时期内，中国的名义工资随着通货膨胀而不断起伏波动，但是实际工资只有很小幅度的上涨。大约从世纪之交开始，实际工资的增长开始大幅度加速，而且从那时开始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幅。在那些次发达地区，实际工资的增长比广东和上海这种工业化城市的实际工资增长得更快。直到 2003 年，实际工资的增长一直慢于平均生产力的增幅，但是从 2004 年和 2005 年开始便领先于生产力的增速了。这一点可以从 2004 年第四季度和 2005 年从业人员收入在工业生产附加值中所占的比例中看出，在这一时间段，这一比例有了大幅增长，彻底扭转了多年以来不断降

低的趋势。

这些归纳概括都是基于一般性的工资数据，而且是混合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因素。一项关于非熟练劳动力的历史数据的研究也指出，非熟练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可能会紧缩。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所带来的人口结构转变意味着现在总的劳动力数量将基本不会增加，因此任何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出农村都意味着农村劳动力的减少。这一趋势将随着时间而不断强化。非熟练劳动力群体的减少可能会尤其严重，因为不断增长的教育方面的公共投资是投资于数量不断减少的儿童身上，这会增加具有较高技术知识人口的数量，也就意味着劳动力大军中更多的新成员被排除在“低技能非熟练”劳动力的范围之外。我们应该注意到，所有成功的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都曾经经过一个劳动力市场的转折点，而这对于该经济体的结构和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认为在这方面中国也不会例外，而且中国的这个时刻将很快到来。

蔡昉和王德文（2006）分析了农村迁移而来的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的发展状况，认为这两者在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农村地区的过剩劳动力的消耗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需求层面上，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加速了国内的贸易自由化，这些都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同时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加偏向劳动密集型，当然这也是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因此，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 20 年里，尽管国有企业改革释放出了大量的劳动力，但是对于非熟练工人的需求还是经历了快速大幅的增长。

在供给层面上，中国已经进入了非熟练劳动力急剧减少的时代。适龄工作人口的数量将在 2016 年达到顶峰，然后会稳定地减少。劳动力中的那些比较年轻的人员，也就是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中来的这些人，将会在这一时间之前就开始减少，因为可以从事低技能工作的这个群体的人口数量将会随着教育扩张和教育质量的提高而快速减少。

蔡昉和王德文因此认为中国已经到达了 this 转折点。

2010 年的证据

2006 年该丛书的《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已在前文中进行了介绍，它也是说明中国进入转折期的部分证据。而《经济学季刊》上的那篇专题所提供的数据和分析则显示出中国正在更加果断、深入地进入转折期。

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使我们难以理解 2006 ~ 2010 年的新证据了，但是这种影响是比较小的。危机的影响很快就被长期的劳动力市场的紧缩趋势所掩盖。全球金融危机在 2008 年末和 2009 年初导致了以出口为导向的沿海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下降。一时之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出现了逆转，过剩的劳动力开始回到农村。而当 2009 年被裁减的农民工重新回到城市工作的时候，有报告称就业出现了下滑。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萧条，中国政府实施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扩张政策，来消除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的影响（Garnaut 与 Llewellyn-Smith, 2009）。到 2009 年中期，这一系列扩张性政策的成功表现在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开始重新出现，之后这一迁移的趋势甚至超过了危机之前的水平，从而也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和通过转折期的进程。

而我们在中国 2009 ~ 2010 年的劳动力市场上看到的现象也正是这两个事件所引起的综合效果。

Du 和 Wang 采用复杂的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数据。最终得出坚定的结论：在经过 20 多年的停滞之后，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在 21 世纪初期开始大幅度增长，而且实际工资的增长态势在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很快恢复过来。非熟练农民工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势头在危机之前是非常强的，仅 2008 年一年就增长了 20%，这一势头在后来劳动力市场紧缩时期一度短暂中断，但在 2009 年又迅速恢复，当年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又恢复为正数。2001 ~ 2009 年间，农民工的实际小时工资增长了 90%，2003 ~ 2008 年间就增长了 80%。非工资福利收入比工资收入增长得更快。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发现将评估基于目前还有的 3 亿农村工人之上是极具误导性的。这些农村工人中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有大笔的非农业收入。对于许多人来说，非农业收入甚至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根据 2004 年和 2008 年的经济统计，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分别增长了 3000 万和 5000 万。经济增长中就业的弹性和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的扩张都预示着，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就业量将每年增加约 2400 万（如果这种弹性或者经济增长不被劳动力短缺或上涨的实际工资所制约的话）。

那么劳动力市场的现实会支撑就业以这样强劲的速度增长吗？人们普遍预计，适龄工作人口数量会从 2006 ~ 2010 年的年均增长 700 万人下降到 2011 ~ 2015 年的年均增长 310 万人，然后 2016 ~ 2020 年则会年均减少约

100 万人，2021 ~ 2025 年更是会年均减少 500 万人。教育方面的人均投资的快速增长意味着未来低技能非熟练劳动力市场缩减巨大。政府近些年来着重于提高农村地区的人均收入和服务的政策，再加上农村人口非农业收入的增长，城市在过去一些年又吸收了大量的年轻的农村工人，这些都进一步限制了农民工劳动力供给的增长。

Du 和 Wang 的分析使人们注意到了劳动者总体的实际工资增长有加速的强劲趋势，而非熟练工人更是如此。

蔡昉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人口数据显示出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可能会出现更为严重的劳动力市场的紧缩。定期的农业成本调研显示，农村剩余的劳动力中潜在的可能会转移到城市就业的人数要远低于其他被广泛引用的研究中所提出的人数。结果就是，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也就是劳动力的供给价格，要远远高于此前我们普遍预计的水平，而且还在不断上涨。

居民调查数据和城市住户报告体系之间的差距也说明在城市地区有超过 9500 万农民工，这一数量也大于此前普遍推测的数量。

进一步的，2000 年的人口普查和 2005 年的样本统计数据显示，国民的出生率低于我们平时进行测试所采用的出生率水平。

所有这些证据都给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合理的预期，即保持实际工资快速增长，其中低技能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更快，是使失去控制的劳动力需求重新与劳动力的可得性保持一致的唯一方法。

转折点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那么转折点对于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对于中国与全球经济的互动以及中国的经济政策有什么影响和启示呢？作者在此会聚焦于四个最重要的结果，提及一个大家广泛预期和担心的结果，同时还会简要探讨一个在进入转折期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理念受到影响的方式。

随着中国更深入地进入转折期，实际工资水平以及工资在收入中的比例都将会继续大幅增长。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收入分配方面出现的日益严重的不公平的趋势将得到逆转。这是一个重要的结果。而收入中工资所占的比例提高可能会反映在经济中消费所占比例的提高。国民的储蓄率则会出现下降。

投资率可能会上升，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是这样。而无论是否出现这种情

况，中国的储蓄率将会比投资率降低得多。这将会使贸易和经常账户的盈余降低，因此也就有助于缓解经常账户不平衡和汇率方面的压力。对于中国来说，确保私人 and 公共部门的投资和消费组成的国内总需求有足够的扩张，从而确保上述情形出现将是很明智的行为。

因此，中国经常账户的盈余下降是经济走向转折期的第二个后果。这有助于缓解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紧张感，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将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当做导致它们自己经济问题的首要原因。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盈余的缩减将不会像这些国家想象的那样有助于解决其自身的经济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储蓄相对于投资来说大幅度减少将会使全球长期内的利率面临上涨压力，同时也会迫使那些在管理对外债务和公共债务方面存在问题的国家减少在商品和服务方面的国内花费，这其中就包括美国。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经济管理问题会变得更加困难，而非更加简单。

中国走向转折期所带来的第三个重要的后果是，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所具有的比较优势的核心将会迅速由相对较少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转移到更大范围、更具资本密集性和技术复杂度的产品上去。这一点有助于缓解中国在面对世界其他国家时所存在的某些贸易问题（其他发展中国家就竞争问题所施加的压力和工业化国家就某些行业的调整所施加的巨大压力），当然也会使得某些问题变得复杂（工业化国家将会有更多的产业感觉到竞争的压力）。中国的比较优势的多样化可能会使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停止下滑，因为此前中国出口产品的增长大部分集中于较少种类产品出口的扩张。

中国进入转折期所带来的第四个后果涉及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关系到经济稳定性和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政策风险。不断增长的实际工资、不断增长的对非贸易品和服务的需求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除非与此同时中国实施坚实的货币政策并使人民币升值。尽管如此，中国当局可能会试图维持人民币兑美元的固定汇率以避免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调整压力，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这类产业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转折期和转折期之后保持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只能推迟而不能避免结构调整，因为这种调整是中国经济增长到目前阶段的一种必然产物。经常账户盈余最终会压倒政府的努力，从而使货币政策无效。最终调整还是会发生，而且是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

中国政府很可能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应对高通胀。这将会不必要地降低经济增长率（指降低到可持续增长率之下），从而使应该在转折期前后发生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推迟。通货膨胀和推迟调整收入分配不公可能会破坏国内政治的稳定性。而推迟削减对外账户盈余则必然会破坏中国与世界经济和社会的有效互动合作。

我想通过指出一个经济体进入转折期和在此之后可能出现的一个结果来结束本文，很多人担心这个结果，但是这个结果只有在出现了错误的经济政策的时候才可能变得重要。同时我还要指出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理念方面的重要启示。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进入转折期和转折期之后其单位工人产出的增长率会下降。当中国走向转折期，实际工资的增长很可能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也上升。在本质上，这都会集中于那些生产相对来说更为复杂和资本更密集的产品的产业中，因为这些产业对实际工资的增长不太敏感。而为了减少对外经常账户盈余，中国需要增加国内需求，这又需要投资率在一定时期内增加。再加上劳动力增长的加速，这些因素都会促进单位工人的产出增长率有所提高，比 21 世纪早期的水平更高。这一点将会给世界一个惊喜，同样也会使中国感到惊喜，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则需要维持内外的平衡。

在实际工资增长的时期内，中国在经济上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功将取决于经济的灵活性，也取决于在对外贸易、投资方面的开放性，以及吸收世界上先进企业管理经验的有效性，还取决于过去的 20 多年里快速扩张的教育体系所培养的人力资源的质量，以及将在更复杂的经济环境中采用的管理体系的质量。很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中国总产出的增长率将会维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的平均水平上下，直到中国“追上”工业化国家并接近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

无论中国能否在达到世界经济水平之前保持如此高的总体经济增长速度，既然现在中国进入到了转折期，大多数观察家们将会被中国如此迅速追上世界经济所震惊。中国的实际汇率会快速上升，无论是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名义汇率升值的方式还是二者结合的方式。而中国的产出的价值，无论是以本国货币衡量还是根据当今的汇率转换成为国际货币衡量，都将会代表更高的“购买力”。通过研究增长率这样的传统方式衡量国民产出的中外人士会发现，中国追赶世界上最具生产力的经济体的人均产出并赶上美国的总产出的速度将会远远高于他们的预期。

致 谢

本章概念上的核心内容来自于即将发表于《经济学季刊》上的一篇论文：《经济转折点的宏观经济含义》（“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he turning point”）。作者在此感谢该杂志主编同意将相关内容在此发表。

（王之堂 译）

参考文献

1. Cai, F. (forthcoming), ‘Demographic transition,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Journal*, Special Edition.
2. Cai, F. and Wang, D. 2006, ‘Employment growth, labour scarcity and the nature of China’s trade expansion’, in R. Garnaut and L. Song (eds),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ia Pacific Press, Canberra, pp. 143 – 71.
3. Du, Y. and Wang, M. (forthcoming), ‘A discussion on potential bias and implications of Lewisian turning point’, *China Economic Journal*, Special Edition.
4. Fei, J. C. H and Ranis, G. 1964a,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 Theory and policy*, Richard D. Irwin, Homewood, Ill.
5. Fei, J. C. H and Ranis, G. 1964b,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 theory and poli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1, pp. 147 – 74.
6. Fei, J. C. H. and Ranis, G. 1966, ‘Agrarianism, du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 Adelman and E. Thorbecke (eds), *Theory and Desig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7. Garnaut, R. 2006,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 Garnaut and L. Song (eds),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ia Pacific Press, Canberra, pp. 1 – 11.
8. Garnaut, R. (forthcoming),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he turning point’, *China Economic Journal*, Special Edition.
9. Garnaut, R. and Huang, Y. 2006, ‘Continued rapid growth and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 Garnaut and L. Song (eds),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ia Pacific Press, Canberra, pp. 12 – 34.
10. Garnaut, R. and Song, L. (eds), 2006,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ia Pacific Press, Canberra.
11. Garnaut, R. with Llewellyn-Smith, D. 2009, *The Great Crash of 2008*, Melbourne University Publishing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China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Beijing].

12. Lewis, W. A.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vol. XXII (May), pp. 139 – 91.
13. Minami, R. 1973, *The Turning Point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apan's experience*, Kinokuniya Bookstore, Tokyo.
14. Minami, R. 1986,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A quantitative study*, Macmillan, London.
15. Ranis, G. and Fei, J. C. H. 1961,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1, no. 4, pp. 533 – 65.
16. Ranis, G. and Fei, J. C. H. 1963, 'The Ranis-Fei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pl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3, no. 3, pp. 452 – 4.